

西方社會撕裂的縮影 ——美國大學抗議運動觀察

●張 豐

2024年4月開始的美國高校學生抗議運動，隨着各地警方陸續「介入」和「清場」，表面上告一段落。但是它所反映的困惑，並沒有獲得解答。抗議運動的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更是陷入困境。校方請求警方進入校園清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舉辦畢業典禮。但是在清場之後，畢業典禮最終還是取消了：問題沒有解決，更是帶來了新的問題。

一 校長和大學的「潰敗」

這次學潮有明確的起點，就是4月17日哥大校長沙菲克(Nemat M. Shafik)到華府參加國會聽證會。去年12月，哈佛、麻省理工、賓夕法尼亞和布朗大學的校長，已經經歷了這樣的質詢。他們要回答的問題是：大學校園內聲援巴勒斯坦的集會和遊行，以及學生所呼喊的口號中，是否存在「反猶主義」？校長的回答是：是否存在「反猶主義」，要看具體語境。這個

回答引來美國社會的普遍反彈，很多人質疑校長是在為學生的「反猶」言論開脫。賓大校長瑪吉爾(Elizabeth Magill)隨後宣布辭職，而哈佛校長蓋伊(Claudine Gay)堅持了一段時間之後，也黯然辭職。哥大教授普遍認為沙菲克「躲過一劫」，因為如果她在去年12月到國會作證，她的回答不會有甚麼不同。這不僅是因為幾所大學的律師團隊都差不多，也因為美國東北部幾所名校有着相似的校園文化。但是這一「劫」並沒有真的躲過，相反，隨着時間推移，原有的矛盾變得更加尖銳了。去年12月以來，哥大幾乎每周都有學生抗議活動，而國會對哥大的指控和調查也在不斷加強，要求學校確保猶太裔學生安全。

表面上看，抗議學生的訴求「像是否吃草莓一樣無關緊要」(1968年學生抗議活動前哥大校領導的名言)，但實際上，來自猶太人社區和國會議員方面的壓力一直升溫，校方也不得不更認真對待。哥大採取的措施是，不斷壓縮學生抗議的空間，不讓他們

在標誌性建築物勞紀念圖書館 (Low Memorial Library) 前舉行集會，因此學生只得在校園各處遊走。4月17日，沙菲克出席國會聽證會，接受眾議院教育委員的質詢。就在質詢期間，學生的抗議行動也同時升級，他們在巴特勒圖書館 (Butler Library) 前東側草坪上搭起了帳篷。身在華盛頓的沙菲克，感受到更大壓力。校方第一次「要求警察進校園清場」，警方逮捕了一百餘名在帳篷營地的學生。

正是這次清場行動，點燃了美國常春藤大學的抗議熱情。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的學生紛紛舉行集會，聲援「哥大的同志」。4月18日，哥大學生重新佔領了巴特勒圖書館前西側的草坪，參與抗議的學生更多，他們正式建立了「營地」。當天下午，哥大學生手拉手環繞草坪遊行，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此後，全美幾十所大學捲入抗議行動。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不管是學生還是警方，行為都更激烈。埃默里的校長請求警方進入校園清場，學生抵抗警察的抓捕，兩位教師在「保護學生」的時候，被警察摠倒在地。隨後，埃默里的教授發起罷免校長的不信任案，有超過70%的教授「不信任校長」。

在「運動」的中心哥大，校方逐漸失去耐心。4月29日上午，學校突然發布通知，要求營地的學生在下午2點前必須撤離，否則將面臨包括停學在內的處分。但是，當最後時刻到來的時候，營地學生不但沒有離開，而且發動了最大規模的遊行，包括非裔、亞裔在內的很多學生都參加了遊行活動。30日凌晨1點，抗議學生佔領了漢密爾頓大樓 (Hamilton House)。這是標誌性時刻，或許並非巧合，1968年

學生運動也佔領了漢密爾頓大樓，而且在4月30日這一天達到了高潮，警方向大樓發起猛攻，隨後逮捕數百名學生。此後半個世紀，哥大發生過多次學潮，每一次都以佔領漢密爾頓大樓結束。運動總會結束，要麼達成訴求，要麼被警方清場。

4月30日晚上8點，紐約警方在收到沙菲克的「請求信」後，展開清場行動，再次逮捕了一百餘名學生。校方請求警方在校園留駐到5月17日，哥大隨之進入「封閉管理」。與此同時，包括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在內，全美各大有「抗議營地」的大學都被警方清場。

二 反對以色列、反戰和「反猶主義」

回顧整個學生抗議行動，最不能忽視的那個根本性問題，就是「美國大學真的存在強烈的反猶主義」嗎？這是導致去年12月「校長潰敗」的詰問。幾位著名學府的校長對此的回答是，「一切都依賴於語境」。她們（幾位校長都是女性）的基本想法是，不能簡單看口號，而是要看具體的語境。在國會議員咄咄逼人的質詢面前，這樣的回答是不能過關的。國會明確認定，有些語言是「反猶主義」，最有代表性的一句就是「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終將自由」(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並不意外，在國會認定這句口號「有問題」之後，它反而成為學生抗議行動的主要口號。這就是「運動」的邏輯。運動必須「反對」，當權者愈是指定不能觸碰的禁忌，就愈有可能成為反對者抗議的對象。

一個事實是，這次抗議風暴的中心哥大學生營地，不但有聲援巴勒斯坦的同學，也有一些猶太裔同學，他們同情加沙婦女兒童的處境，主張盡快實現和平——兩邊的同學，甚至一起過了猶太傳統節日逾越節。可以肯定，在營地是不存在「反猶主義」的行為的。至少在紐約，「猶太人群體」並不是一個高度一致性的概念，而是有各種各樣的訴求。紐約猶太教教會工作人員也到哥大校門舉牌抗議，他們抗議的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以色列政府和「猶太復國主義」。

4月下旬，哥大多位猶太裔教授在接受採訪和電視節目中，都否認了校園存在「反猶主義」。他們的普遍態度是，學生的抗議口號可能有點「過激」，但是很難說是達到「反猶主義」的級別。哥大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和筆者的談話中也持這樣的看法，作為猶太人，他認為「部分猶太人，過於敏感了」。這就是高校內的「共識」。這也不難理解，為甚麼去年幾位校長接受質詢

的時候，會有那樣的回答。這並不是她們水平不行，她們表達的就是教授群體的普遍認知。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在於，對美國社會而言，儘管沒有德國那樣強烈，「反猶主義」也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最近，國會甚至在討論專門立法來「反對反猶主義」。5月1日，眾議院通過一個所謂的《反猶太主義意識法案》（*Antisemitism Awareness Act*），這個法案主張將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對「反猶主義」的定義，編入美國的《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根據IHRA的定義，「反猶主義是對猶太人的某種看法，可能表現為對猶太人的仇恨」，它還有一些「應用實例」，比如「指責猶太人作為一個民族要為某個猶太人或猶太人團體犯下的真實或想像中的錯誤行為負責」、「對猶太人或猶太人團體的力量進行虛假的、非人化或刻板化的指控」。這個法案已經被送到參議院進行討論。在美國，它可能面臨非常大的爭議，因為把某言論認定為「非法」，和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存在內



紐約猶太教神職人員在哥倫比亞大學校門外抗議「猶太復國主義」。（張豐攝）

在的衝突，或許需要在最高法院討論，才能形成判例和規範。

即便是按照這個法案，認定「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終將自由」是否屬於「反猶主義」言論，仍然存在問題。人們反感這句話，是因為這句話同時也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口號。當哈馬斯使用這句口號時，可以理解為「對以色列進行滅國」，是「反猶主義」的；但是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報導，這句話早在哈馬斯出現之前二十年，就已經相當流行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韋克斯曼(Dov Waxman)認為，它在不同的語境中有着不同的意思。當然，這種「知識考據」在現實中沒有太大意義。一個普通猶太人和一個哥大猶太裔教授，路過抗議隊伍聽到抗議口號，感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哥倫比亞每日觀察家》(Columbia Daily Spectator)曾經發布過一個調查，指出確實有相當一部分猶太人的感受是「不安全」，這種感受無疑也是真實的。在哈佛、哥倫比亞這樣的大學，猶太背景的財團一直是重要的捐助者。今年2月，一度傳出美國億萬富翁卡夫特(Robert K. Kraft)對「校園仇恨活動」十分失望，要撤回對哥大捐款的消息。即便名校資金充足，也不得不考慮所謂「金主」的感受。

儘管批評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反猶主義」等不同的概念指向不同的現實，但是很難要求普通人進行學理的區分。事實上，任何對以色列的批評，不但會讓一部分猶太人不舒服，甚至也讓支持以色列的自由派感到反感——這確實反映出世界的撕裂，只有兩個陣營的「鬥爭」，「中間地帶」愈來愈狹窄。

三 薩義德、左派和美國大學的自由

美國兩黨對以色列的支持幾乎是一種本能，儘管出發點略有不同。在聯合國，任何不利於以色列的議案，他們都會投否決票。對烏克蘭的軍費支持在國會尚有分歧，而對以色列的軍援從來就沒有疑問。

但是美國的大學是另一個世界。哥大一位抗議者舉的牌子上寫着：「哥倫比亞，既然你不讓我用薩義德教授的理論，為何又要求我讀它呢？」(“Columbia, Why require me to read Prof. Edward Said, if you don't want me to use it?”)這句話說明很多。巴勒斯坦裔思想家薩義德(Edward Said)的著作，在美國一流大學的不少文科專業，都屬於必讀書目。薩義德的《東方學》(Orientalism)等著作，揭示出「西方」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文化霸權」，在哥大有着眾多的追隨者。再擴展一點：自1968年學潮以來，來自左派的思想在美國高校中佔據主導地位。反對殖民主義(尤其是揭示藝術、電影、廣告等大眾文化領域的西方中心主義、白人至上)、反對種族歧視、環保主義、動物權益、女權主義、性別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等等，都因為其對現實的批判，深受學生喜愛。幾代人下來，這些思想的追隨者，也成為大學文科教授的主流。

每一種批判理論，都對應着現實中某種「受壓迫」的少數派群體。如果說美國主流社會「支持猶太人」佔據主導地位的話，美國高校則有「同情巴勒斯坦」的文化傳統。你也可以把「巴勒斯坦」換成同性戀、少數族裔或任何權力關係中的「受壓迫」一方。

在營地中，一位來自克什米爾地區的女生告訴筆者，她從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中看到了自己的命運。這種「情感投射」其實相當普遍。一方面，學生抗議行動確實有具體的指向，要求以色列不要製造「人道主義災難」，要求大學不要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很多年輕人參加抗議行動，喜歡的就是「抗議」本身。來自紐約革命書店 (Revolution Books) 的傳單，對美國大學進行嚴厲批判，認為它們受到資本主義精英階級的控制。這種典型的左派革命理論似乎已經過時，如今的大學生並沒有太多的「階級意識」，但是，一種更廣泛的反抗是真實存在的。

就哥大來說，這次運動中學生的兩大訴求，其實都可以看作是1968年學潮的「回聲」。1968年學潮的兩大訴求，是「要求哥大從和國防部的合作中撤出」（反越戰）和「反對修建晨邊公園體育館」（因為體育館專門設計一個「供黑人出入的後門」，涉嫌種族歧視）。當下的主要訴求，則是要求哥大從以色列「撤資」，這既和反戰有關，也和種族相關。時代不同，但是「反抗」的內在邏輯則是一致的。作為一句「革命口號」，「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終將自由」朗朗上口，有着某種魔力。在國會的「禁忌」加持下，它似乎更有一種特別的情感。筆者至少聽過抗議隊伍上百遍呼喊，大多數時候重音都在「自由」（free）上。對那些白人、黑人、黃種人而言，他們在曼哈頓街頭喊這句話，更受觸動的無疑是「自由」這個詞帶來的激情，而不是「巴勒斯坦」。

一種常見的指責是，美國一流大學「政治正確」過頭。被國會點名質詢的幾所大學，校長要麼是黑人，要

麼是女性，在一些「保守主義者」看來，這就是大學「政治正確」的結果。年初，筆者要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據說第一次參會名單被否決，因為主辦方突然意識到缺乏女性學者，擔心受到指責。還有一種對學生的常見指責，就是「難道誰弱誰有理」，認為不應該無原則同情巴勒斯坦，要求抗議學生反思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襲擊。這樣的指責並非毫無道理，代表着某種社會情緒。但是，正如前述那位薩義德追隨者所展示的標語那樣，幾十年來在高校中，「左派」不僅是思想和理論探索，而且是一種廣泛的實踐，甚至發展為一種生活方式。正是這樣的實踐，構建了美國大學獨特的文化：包容、多元、尊重和保護少數派。實際上，過去幾十年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的「進步」，相當一部分都源於大學的實踐對社會的輻射。在克服種族歧視、性別平等方面，人類已經享受到進步主義的成果。

但是，它真的過頭了嗎？這不是一個有清晰答案的問題。可以確定的是，保守主義的「反彈」也是真實存在的，而作為進步主義的大本營，美國大學注定要承受這種怒火。筆者注意到《紐約時報》在社交媒體X（原推特[[Twitter](#)]）上報導警察進入哥大清場的新聞，獲讚最多的評論是一個詞——“god”。

四 大學正承受社會的怒火

這次學生抗議運動中，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哥大和埃默里的校長在向警察寫信「請求清場」的時候，都隱約提到「校外力量」對學生情緒的

利用(有點像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境外反對勢力」)。哥大的抗議行動，實際上存在兩個「戰場」，校內是圖書館前的帳篷營地，而校外則是來自社會各界的集會。校內營地往往是安靜的(雖然有詩歌朗誦和演講等活動)，而校外則是鑼鼓喧天，動靜頗大。校外的場地上，不但那些被指責為「反猶主義」的口號非常常見，在一些短視頻的特寫鏡頭中，抗議人群也多有猙獰面目。

學校請求警察清場，理由是那些學生「非法侵入財產」，並不是他們的言論和主張，也不是「影響公共安全」(這明顯需要提供更多證據)，某種意義上也表明，校外的抗議活動是完全合法、正當的。幾乎每次集會都有大批警察在場，他們的職責是維護治安，防止可能出現的衝突。在哥大門口，從來沒有出現過激烈衝突和抓捕。這就形成一個悖論：校內參加抗議的大學生，全部都是法律意義上的成年人。在校外進行抗議都是正當的，為甚麼校內就不行？人們對大學是否有着特別嚴苛的要求？

就哥大來說，認為學生營地影響學校日常運作是毫無道理的。營地就在圖書館前，不管是拍畢業照還是進圖書館查資料，都沒有任何影響。實際上，真正影響師生的是學校的封閉管理，自警方「接管」大學後，很多學生抱怨無法進入校內圖書館查資料。所以，在邏輯上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主流社會」對大學有着非同一般的期待，或者說有着某種深層次的不滿。而在另外一個角度，為大學進行辯護的人們也強調：校內校外是不同的，學校內發生的事情，不應該請警察來解決。

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來自《紐約客》(*The New Yorker*)專欄作家梅蘭(Louis Menand)，在4月29日為該雜誌撰寫的封面文章中，他認為「學術自由正受到攻擊」(*Academic Freedom Under Fire*)，他在文章中對沙菲克進行了嚴厲批評。有意思的是，在這篇探討學潮的文章中幾乎沒有提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他的看法是，在大學校園內，一切言論都應該受到保護。他認為學院的這種自由至關重要，「政客們鄙視它，大學管理層不保護它，但正是自由讓美國高校偉大。如果失去它，我們將會懷念它」。就整個4月學生運動的發展進程來說，真正引發高校師生怒火的，並不是加沙局勢的進展，也不是美國在聯合國支持以色列和進行軍援，而是「警察進入大學校園」這個事實。如果沒有哥大的「清場事件」，就不會有「運動」的蔓延。如果說前半程的抗議還關注加沙的話，後半程的運動則找到了真正的對手：警方和權力機構對大學的干涉。

相比於法學、政治學教授的立場，哥大建築系教授馬丁(Reinhold Martin)的說法可能更有代表性：「當初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時候，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四周後才請警察，現在學生帳篷才一天，學校就請警察進來，非常不合適。」這是很樸素的看法，大學的獨立性和自由，應該受到保護，但是，「社會」或者「權力」，對大學似乎愈來愈嚴厲了。如果說存在一種「左」(大學裏左翼師生)和「右」(支持以色列)的衝突的話，這次抗議還存在一種「內」與「外」的衝突：高校這個「獨立王國」，正受到主流社會的審視。它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觀念撕裂的一種反

映。在社會變革時代，人們需要為自己的不滿找到一個解釋，而大學就成為了替罪羊。這種分裂在眾議長約翰遜 (Mike Johnson) 到哥大的「講話」中體現得尤為充分。

4月24日，約翰遜在和哥大猶太裔學生會面後表示，將發表講話督促校長辭職。當天下午4時，勞紀念圖書館前的廣場上聚集大量學生，準備聆聽議長的高見。約翰遜如期出現，但是他卻沒有打開麥克風，同學大喊「我們聽不到你」，他也不為所動。他發表一個簡短的演說，只有第一排的記者才能聽到。議長的講話在電視台播出，「好好學習，不要浪費父母的錢」。議長風度翩翩，溫和理性，面帶微笑，觀眾對學生的不滿和誤解又加深了。但是，現場中的同學沒有聽到他任何一句發言。對這樣的場面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比如認為約翰遜是在上演「政治戲劇」，或者代表共和黨想打擊民主黨在高校的影響力。筆者認為這是很有隱喻性的一幕：學生抗議的目的，就是讓社會「聽到」自己的訴求，但是主流社會似乎並沒有溝通的意願。沙菲克多次呼籲「社會的連結」，但是社會的撕裂擴大化的趨勢，似乎難以避免。

五 結語

和1968年學潮相比，這次學潮的「烈度」非常有限。佔領漢密爾頓大樓的同學，損害的財物只是一塊玻璃。紐約警察的「抓捕行動」非常有視覺效果：空中有直升機，全副武裝的警察本來可以輕鬆進入大樓，卻要使用一個「便橋」設備，伸進大樓的二樓。大樓內的同學早已做好被捕準備，沒

有任何反抗。這幾乎是當下社會運動的縮影。在世界各地，警察的力量非常強大，抗議者在本質上失去對抗的可能。哥大學生的「抗議」從一開始就強調了它的「和平」性質。營地有着詳細的守則，最重要的兩條是，「避免和不同意見的人發生肢體衝突，建議送上擁抱」；「警察來抓捕的時候，不要作任何反抗，在律師趕到之前，保持沉默」。



營地女生正在製作標語。(張豐攝)

那些在營地充當「臥底」的記者，最近開始發回長篇報導。人們得以了解「營地」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的存在：這裏是一個臨時的社區，有自己的守則，有醫療團隊和「圖書室」，也有心理輔導。這裏有詩歌朗誦和音樂節目單，有冥想也有舞蹈。這是「抗議運動」的另一面，它其實隱藏着「建設」和「愛」。這是諸多問題的答案，但是人們假裝看不見。

張豐 專欄作家，常住成都，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